

# 雷鋒：黨—國倫理符號的 建構與解構

• 陶東風、呂鶴穎

雷鋒，一個革命時代經過意識形態的廣泛宣傳和刻意塑造的道德英雄，在經歷了新啟蒙文化和消費文化浪潮的洗禮之後，成為解讀商業化、大眾化時代革命與商業、政治與經濟之間曖昧關係的絕好案例。

2003年，新浪網聯合內地十七家強勢媒體，曾共同舉辦了「二十世紀文化偶像」評選活動，最終評出的十大文化偶像包括：魯迅、金庸、錢鍾書、巴金、老舍、錢學森、張國榮、雷鋒、梅蘭芳、王菲。一時間社會各界議論紛紛，但大家對革命時代國家意識形態建構的政治—倫理符號「雷鋒」的入選卻談論甚少。

在這次評選活動中，雷鋒的入選評語是：「雷鋒精神曾經影響了一代人，他堪稱是共產主義新型人格的代表，也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整體形象的一個縮影。他所承載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是集體主義文化傳統在新時期的發展。」<sup>①</sup>這個評語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把「雷鋒精神」簡化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和「集體主義」，淡化了雷鋒忠於黨、忠於毛澤東的內容，使這個偶像的道德內涵朝抽象的利他主義傾斜，從而更具普適性；二是說「雷鋒精神」對一代人的影響是「曾經」的。這是一個過去時態。

既然是一個過去時態，那為甚麼在當下的語境中，通過相對民主的網

絡選舉，雷鋒又被選為「文化偶像」呢？我們應該在何種意義上說雷鋒的影響不僅是「曾經」的而且是「當下」的？在這裏不妨做一個猜測：如果我們把問卷改成「如果有可能，你最想成為十大偶像中的誰？」那麼，雷鋒的得票率可能會急劇下降。人們在評選時並沒有把「偶像」與「自己想要成為的那種人」等同起來<sup>②</sup>。不想實際仿效的那類人卻又被選為「文化偶像」，這種曖昧的態度本身已經成為一種文化現象，包含了豐富的內涵，值得我們好好解讀。

如果說這次文化偶像評選中雷鋒的當選反映了革命時代的道德偶像在後革命時代的曖昧處境，那麼，更加曖昧的則是雷鋒在後革命時期遭到各種形式的惡搞：網絡遊戲、初戀女友、吉尼斯 (Guinness，又譯健力士)「士兵之最」，等等，任何與雷鋒相關的事件都會引發激烈爭論，彷彿正是雷鋒的「流行」殺死了雷鋒。

總之，雷鋒，一個革命時代經過意識形態的廣泛宣傳和刻意塑造的道德英雄，在後革命時代不僅沒有像

大多數政治偶像一樣遭到遺忘，反而在經歷了1980年代的新啟蒙文化和1990年代的消費文化浪潮的洗禮之後，變成了一個游弋的能指符號，在後革命時代四處遊蕩、熠熠生輝，這使得雷鋒成為解讀商業化、大眾化時代革命與商業、政治與經濟之間曖昧關係的絕好案例。

如果從1963年3月5日毛澤東題寫「向雷鋒同志學習」，並由官方正式把這一天確立為「學雷鋒日」算起，雷鋒形象已經經歷了近半個世紀的建構—重構歷程。以1978年底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界，雷鋒形象的演變可被分為「革命」和「後革命」兩個時期，其明顯的差別如下：

第一，從政治領域看，黨和政府的工作中心從階級鬥爭、政治運動轉到在確保政體穩定前提下的經濟發展和現代化建設；

第二，從經濟領域看，從單一的計劃經濟轉變為多種經濟成份並存，並在1993年正式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口號；

第三，從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的關係看，黨逐步放鬆了對私人領域的控制，不再進行大規模的社會動員，私人領域有了一定的存在空間和自由度，相應地，與公共利益相對的私人利益也逐步得到一定程度的承認和維護；

第四，在文化和意識形態領域看，主流意識形態逐漸淡化了特殊取向的階級論色彩，有限度地吸收了「普世價值」，扶持、鼓勵大眾文化，對消費主義採取寬容甚至鼓勵的態度；

第五，從社會心理和時代精神角度看，在民間和知識份子中，人們一致厭惡了長期的階級鬥爭，不再心儀曾經讓他們如痴如狂的「革命」，轉而關心自己的日常生活和物質享受。

這些變化對理解雷鋒形象的演變是至關重要的。

## 一 革命時期雷鋒形象建構

建國以來，官方先後樹立了各種政治—道德模範，但大多數此類模範往往應時而生，時過而逝，只有雷鋒是個例外。時至今日，「學雷鋒」仍然是一項被常常踐行的集體活動。這是一個很值得思考的問題。特別是從革命時代到後革命時代，中國社會發生了如此重大的變化，為甚麼「雷鋒精神」卻依然從上到下、從民間到官方被死死堅守？

本文以為，主要原因在於無論是官方主流媒體還是民間網絡媒體，都自覺不自覺地把「雷鋒精神」抽象化、普遍化、空洞化了：雷鋒成為抽象的「好人」的代名詞，雷鋒精神成為「做好事」這一沒有黨派和階級色彩的抽象道德符號。比如，《人民日報》2004年6月19日發表吳若增的文章〈雷鋒的意義〉，認為雷鋒形象之所以在全國人民心目中經久不衰，原因在於「雷鋒已經成為了道德美的典範和人性美的化身」。更有意思的是，作者認為，西方發達國家的社會運轉，既依靠成熟的市場經濟和法治，也不能缺少道德和文化根基，這個根基就是宗教，比方說基督教。在作者看來，雷鋒精神就是類似於西方基督教的中國社會道德根基<sup>③</sup>。這是非常典型的把雷鋒精神抽象化為優秀的民族美德乃至宗教精神、全人類精神的做法。

一種道德偶像，只有在普世化、抽象化之後，才能獲得超越時代和民族（國家）的有效性，但這種道德偶像已經不再具有當初建構的那種具體內涵。

從革命時代到後革命時代，中國社會發生了如此重大的變化，為甚麼「雷鋒精神」卻依然被死死堅守？主要原因在於無論是官方主流媒體還是民間網絡媒體，都自覺不自覺地把「雷鋒精神」抽象化、普遍化、空洞化了。

### (一) 國家效忠與政黨效忠的統一

然而，革命時代的「雷鋒精神」的內核到底是甚麼？不妨看看當時的歌曲《學習雷鋒好榜樣》。從這首非常流行的革命歌曲中，我們可以把「雷鋒精神」基本歸結到兩個核心：首先，效忠於中國共產黨及其領袖毛澤東（歌詞：「學習雷鋒好榜樣，忠於革命忠於黨」），效忠於黨的意識形態（歌詞：「忠於革命忠於黨」、「毛主席的教導記心上」、「毛澤東思想來武裝」），這是「雷鋒精神」的最基本內核；其次，效忠於祖國及其人民（歌詞：「保衛祖國握緊槍」、「全心全意為人民」）。雷鋒之所以成為黨和國家經歷這麼漫長的歲月後仍然堅持的政治—道德符號，正是因為這兩個核心始終未變。

要闡明這點，還得從社會主義中國的民族—國家文化戰略說起。新中國成立以後，現代民族—國家主權的確立給共產黨政權提供了政治上的合法性，但新中國黨的宣傳部門的一個迫切文化任務，是如何通過建構民眾的文化認同以維護新政治秩序的合法性。也正是在這裏，凸顯出建構一個既能符合民族—國家的認同需要，又能鞏固執政黨領導地位，並得到國民廣泛認同的政治文化符號的極端重要性。

建國後出現的很多公共建築、象徵符號、文藝作品，如人民英雄紀念碑、人民大會堂、國旗、國徽、國歌，等等，都是在中央最高領導高度重視、親自指導之下建構的政治文化符號。雷鋒形象的建構目的也在於滿足這個政治需要，其具體操作過程則是：首先，通過文學藝術的或類似文學藝術的創造活動，建構一個易於學習和模仿的政治—道德典型，使國家

意識形態具象化；其次，通過遍及全民的反覆演示和灌輸，使這些政治—道德典型逐漸被民眾認可並內化為自己情感模式和思想—行為模式。

「雷鋒精神」的兩個核心，即忠誠於黨及其領袖，忠誠於國家及其人民，就是按照社會主義中國的民族—國家文化戰略的需要量身打造的。一方面，雷鋒必須有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為人民服務的情懷，這是普世性的道德，能夠被最廣大的民眾接受；但另一方面，也是更為重要的是，這種普世情懷，必須納入到忠於黨及其領袖這種非普世的話語之中，後者必然要突出和強調「雷鋒精神」中的階級立場和黨派立場。《雷鋒日記》中有一段當時近乎國人盡知的名言：「對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溫暖，對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樣的火熱，對待個人主義要像秋風掃落葉一樣殘酷無情。」<sup>④</sup>這個「敵人」當然就是與共產黨作對的「階級敵人」（包括「美帝國主義」）。因此，所謂「為人民服務」中的「人民」是階級論框架中的「人民」，而階級不僅是由經濟決定的，而且是由政治立場決定的：誰熱愛黨、熱愛領袖，誰就是「人民」，否則就是「敵人」，就是「反革命」。對後一類人，雷鋒不但不愛，而且恨之入骨。

因此，「雷鋒精神」絕非只是超階級的、抽象的人類之愛，也絕不可以把「雷鋒精神」簡單理解為人道主義精神或宗教精神，而忘記了革命時期的雷鋒首先是把「毛主席的教導記心上」的戰士。但問題的關鍵是：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利他主義等帶有普遍性的道德話語，並不必然與共產黨的意識形態話語完全隔絕開來。不認清這點就無法識破雷鋒話語的權力機制。

「雷鋒精神」的兩個核心，即忠誠於黨及其領袖，忠誠於國家及其人民，就是按照社會主義中國的民族—國家文化戰略的需要量身打造的。「雷鋒精神」絕非只是超階級的、抽象的人類之愛，革命時期的雷鋒首先是把「毛主席的教導記心上」的戰士。

## (二) 特定時期的政權合法化需要

雷鋒之所以被選為先進典型和學習榜樣，除了建構新中國的民族—國家認同這個根本需要之外，還有一個很具體的、與1960年代的特定政治形勢相關的需要<sup>⑥</sup>。毛澤東題寫「向雷鋒同志學習」的時間是1963年3月，而「學雷鋒運動」則始於1960年。1959到1961年期間，大躍進等一系列浮誇運動導致新中國經歷了前所未有的「三年困難時期」；加上國際上的反華勢力排擠中國，中蘇關係惡化，中國共產黨及其所創立的新中國處於內外交困的危急關頭，各種社會問題頻發。這個時期很可能引發全黨和全國的信仰危機、精神危機，甚至引發共產黨政權的合法性危機。

由於當時一窮二白，國家根本無法從物質上解決民生問題，因此不能不從思想上、精神上、道德上想辦法。對此，毛澤東採取了軟硬兼施的手段，一方面是實施「無產階級專政」；另一方面則大力樹立無限忠於黨、「聽毛主席話」的正面政治—道德典型。雷鋒於是應運而生。正是這個具體的形勢需要決定了「雷鋒精神」的內核：對黨和領袖無條件盲目崇拜、絕對擁護；只奉獻不索取；沒有反思和獨立思考能力，沒有個體意識和主體精神，完全不知道個體權利為何物。這是一個革命工具型的「螺絲釘」，而且永不生鏽。

《雷鋒日記》大量記錄了雷鋒的這種絕對聽話、從不反思的言論，諸如「黨和領導叫怎樣去做，就不折不扣地按黨的指示去做」，「處處聽黨的話；堅決地、無條件地做黨的馴服工具」<sup>⑦</sup>。而對待所謂的「自然災害」，雷鋒認為，「為着克服這些困難，就要

充分地聽黨和毛主席的話」<sup>⑧</sup>。他完全不知道所謂的「自然災害」和毛主席的浮誇風有何關係；就在全國陷入大饑荒、大量農民餓死的時候，雷鋒卻這樣告誡其同胞：「同志，……能當家作主，自由地生活，您有如何的感覺呢？有一種說不出的幸福感。這是黨和毛主席、革命前輩流血犧牲給您帶來的。」<sup>⑨</sup>很顯然，這個愚忠的、沒有主體性的、不會思考的道德典型，正是1960年代共產黨和毛澤東鞏固權力合法性所需要的。

此外，1960年代初期國家經濟陷於崩潰邊緣，農村地區橫屍遍野，「節約」於是就成為國家的一項重要政策，而「雷鋒精神」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勤儉節約」。入伍不到十個月的雷鋒積極響應黨的「節約鬧革命」的號召，撿牙膏皮、補襪子，被選為「節約標兵」。不過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依據最近幾年披露的內幕，「節約標兵」雷鋒其實並不節約，還擁有手錶、皮夾克等在當時十分罕見的奢侈品；更讓人吃驚的是，雷鋒具有很濃厚的小資產階級習氣，「愛臭美」<sup>⑩</sup>。這些和「節約標兵」、「毛主席的好戰士」不吻合的因素當然都在雷鋒形象的建構過程中被小心地剔除了。

同時，雷鋒還把節約行為納入感恩話語之中：食不果腹、衣不遮體還要感恩戴德。當有人問雷鋒厲行節約的原因時，雷鋒就開始憶苦思甜，講述自己的身世和苦難，表達對共產黨和毛主席的感恩之情。這個時候恰逢全黨、全軍、全國在開展「憶苦」教育，於是雷鋒便成為了「憶苦思甜」的典型，到處去做報告。1960年11月26日，張峻、趙志華、佟希文、李健羽等「集體採寫」的〈毛主席的好戰士——雷鋒〉刊登在《前進報》上<sup>⑪</sup>，從此拉開

「雷鋒精神」的內核：對黨和領袖無條件盲目崇拜、絕對擁護；只奉獻不索取；沒有反思和獨立思考能力，沒有個體意識和主體精神，完全不知道個體權利為何物。這正是1960年代共產黨和毛澤東鞏固權力合法性所需要的。

了雷鋒這個典型的宣傳走出部隊的序幕。這是雷鋒神話建構的開始。

### (三)「母／父子」關係模式和獻身倫理的確立

從雷鋒事迹看，他具有平民化特點，缺乏共產黨英雄人物的神奇經歷，完全是一個普通人。他是所謂「毛主席的好戰士」，卻沒有任何戰爭經歷。他所做的每件事情都是常人力所能及的，如刻苦學習《毛選》，做好事不留名，等等。平民化的特點使得每一個學習雷鋒的人都覺得與對象之間不存在不可逾越的距離。這體現了雷鋒這個典型的親和性、普遍性和代表性。雷鋒外在形象的建構也著意體現其平民化的特點：不高的個頭，一張年輕、帶些稚氣的臉上掛着天真單純的笑容。

但如此平凡的雷鋒，也具有自己的優勢，這就是他的「出身」。「孤兒」出身不但使得他合乎政治的正確性和階級血統的純正性，而且有資格被塑造為典型的「黨／毛主席的兒子」。作為孤兒的雷鋒受夠了舊社會的「鞭子」，新中國成立以後，雷鋒分得了土地，並在黨和政府的關懷下進入學校讀書，後來參軍、入黨<sup>①</sup>。這一切使得他具有階級的先進性。他對黨和毛主席有無限的感恩之情，如一個孩童在精神上對母／父親的依戀與服從。他在日記中記錄了典型的宗教式偶像崇拜：「敬愛的毛主席呀！毛主席，我天天想，月月盼，總想見到您。您老人家的照片，我每天要看好幾次，您老慈祥的面孔，我在夢中經常見到。我多麼想念啊，何時能夠真正見到您。」<sup>②</sup>他還多次把黨和毛澤東稱為「把我哺育大」的「慈祥的母親」<sup>③</sup>。

這樣，雷鋒的故事所着力建構的就是雷鋒與黨及其領袖之間的一種「母／父子」關係：黨及其領袖毛澤東是雷鋒的再生母／父親。這個「母／父子」關係敘述模式在雷鋒形象的建構中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從另一個角度看，雷鋒的認母／父過程，同時也是雷鋒作為一個人的異化過程：母／父子關係的建立不僅意味着黨及其領袖再生為雷鋒的「母／父親」，更意味着雷鋒再生為黨及其領袖的「兒子」——雷鋒因此不再是一個具有感性血肉之軀的個體，而變成一個抽象的效忠符號。朱大可從類似精神分析的角度說：「正是由於童年歲月的打擊，雷的生命的全部意義都是凝聚到與母體有關的事物上來了。從尋找一個具體的母親替身出發，他的信念不斷推演和上升，直至向一個形而上母體作徹底的皈依。……雷說，母親只生養了我的肉身，而黨的關懷卻照耀着我的靈魂。」<sup>④</sup>

這種母／父子關係和帶有感恩情結的話語在有關雷鋒的文本中隨處可見，在雷鋒形象的建構中居於核心地位。正如朱大可分析的：「雷要拋棄掉與他的感性生命相聯繫的部分，向一個形而上母體奉獻螺絲釘式的全部關懷或忠誠，同時他請求得到照亮心靈的溫暖光線。可以把他『唱』這支『歌』的過程看作一個極其嚴肅的儀式，從此，雷獲得了靈魂的新生，並且成為一個符合國家倫理的新人。」<sup>⑤</sup>從感恩情結中直接產生了雷鋒對黨和毛的宗教式忠誠，以及所謂「集體主義」和獻身倫理：「從我參加革命那天起，就時刻準備着為了黨和階級的最高利益犧牲個人的一切，直至最寶貴的生命。」<sup>⑥</sup>在這裏，雷鋒很明確地把黨和階級的利益看成是「最高利益」，

「孤兒」出身不但使得雷鋒合乎政治的正確性和階級血統的純正性，而且有資格被塑造為典型的「黨／毛主席的兒子」。雷鋒的故事所着力建構的，就是雷鋒與黨及其領袖之間的一種「母／父子」關係。

既不是自己個人的利益，也不是全人類的利益。可見，其獻身倫理和效忠話語並非普世的人道主義。

#### (四) 學《毛選》與改造思想

熱愛毛澤東、聽毛主席話的具體表現就是學《毛選》。雷鋒故事的中心內容之一就是講述他如何像一個教徒閱讀《聖經》那樣懷着極大虔誠之心如飢似渴地閱讀《毛選》，藉此不斷改造自己的世界觀。如《雷鋒日記》1959年11月×日寫道：「今天，我感到特別的高興，一天緊張工作過後，一點兒也不覺得疲勞，我感到渾身是勁，夜晚，我還坐在車間調度室裏，看一本學習毛澤東同志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書，真使我看得入了迷，越看越感到毛主席的英明和偉大。」<sup>①</sup>

毛澤東思想的核心內容之一，就是強調「政治掛帥」和「思想改造」，認為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統帥和靈魂，必須統帥其他工作（比如經濟、科技、日常生活），於是造就了中國特色的「學習文化」、「改造文化」、「反省文化」、「檢討文化」。反省和檢討的主要內容是反覆檢查自己是否有「私心」，是否做到了徹底的「公而忘私」，「狠批私字一閃念」成為當時中國「改造文化」的格言。個人利益、個人意識、個人權利，凡是和個人相關的一切，就這樣被釘在了中國「改造文化」的恥辱柱上。

雷鋒成為「英雄」見證了毛澤東這個教父的偉大和神奇。「向雷鋒同志學習」的題詞發表之後，每年3月5日成為了「學雷鋒日」，學雷鋒活動的神聖化、儀式化趨於極致。雷鋒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享受如此殊榮的平民。這一點充分表明了毛澤東在雷鋒形象建構上發揮的至關重要的作用。

「學雷鋒」的實質就是聽毛主席的話，神化雷鋒的實質是神化毛澤東。

#### (五) 「雷鋒精神」的變與不變

從毛澤東題詞發表至今，也不乏對如何依據時代要求重構雷鋒精神的討論。這些討論無不與特定時期意識形態的宣傳導向以及形勢的需要密切相關。

然而，儘管不同時期的雷鋒形象和雷鋒精神有些差異，但其基本內核卻保持了大體的穩定性（特別是在革命時期），其兼顧、統一國家—人民效忠與政黨—意識形態效忠的話語策略也沒有根本變化。拿《人民日報》中標題帶有「雷鋒」名字的專論文章來說，1963年的標題文章強調和突出的是「不忘階級仇恨」、「用無產階級世界觀改造自己」、「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1977年的標題文章則出現了「反修防修，抵制資產階級思想」、「深抓狠批『四人幫』」等新的時代內容和政策口號；1981年的文章更有了「搞四化要幹一行愛一行」、「五講四美」、「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等提法<sup>②</sup>。從中可以看到，雷鋒形象的意識形態建構往往隨着國家政治形勢的變化而變化，雷鋒精神內涵在具體表述過程中也得以不斷選擇與重構。但其內涵的核心，即兼具國家認同建構與政黨意識形態宣傳的雙重使命這一點，則是延續不變的。

在雷鋒形象的官方建構中，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它是官方版本的雷鋒精神的權威闡釋者。革命時期《人民日報》對雷鋒形象的建構大致可以分為兩個大的時期：

第一個時期是1960年代，雷鋒形象建構的重點是突出雷鋒的政黨效忠

雷鋒形象的意識形態建構往往隨着國家政治形勢的變化而變化，雷鋒精神內涵在具體表述過程中也得以不斷選擇與重構。但其內涵的核心，即兼具國家認同建構與政黨意識形態宣傳的雙重使命這一點，則是延續不變的。



雷鋒

儘管粉碎「四人幫」後《人民日報》對雷鋒精神的闡釋發生了引人注目的變化，總體傾向是淡化「階級鬥爭」，轉而突出「四個現代化建設」、「做新長征突擊手」和「為人民服務」，但雷鋒精神依然兼顧「無產階級戰士」和「好人」兩個方面。

和領袖效忠。1963年是學習雷鋒的第一個高峰年：詩人賀敬之創作了長篇政治抒情詩《雷鋒之歌》；「毛主席的好戰士」稱呼被廣泛使用<sup>⑨</sup>；毛澤東的題詞「向雷鋒同志學習」，連同羅瑞卿的文章〈學習雷鋒——寫給《中國青年》〉發表在3月2日的《中國青年》雜誌；3月5日，新華社發通稿，號召全國人民向雷鋒學習，同日《人民日報》也發表了毛澤東的題詞以及羅瑞卿的文章<sup>⑩</sup>。這些文章一致強調的是雷鋒「聽毛主席的話，認真學習毛主席著作，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自己」。可以說，在這個時期雷鋒形象的建構中，政黨意識形態宣傳的色彩比較強，普世價值、傳統美德的一面沒有得到強調<sup>⑪</sup>。

第二個時期是1970年代，而1977年又具有轉折性意義。這年的3月5日是粉碎「四人幫」後的第一個「學雷鋒日」，學雷鋒的活動被推向新的高潮，全國各地重新出版、印發了《雷鋒日記》和《雷鋒的故事》，各大報紙都發表了數量和篇幅都十分可觀的與學習雷鋒相關的文章，並常常配以大量《雷鋒日記》刊出。當時，《人民日報》發表了高規格的「兩報一刊」社論〈向雷鋒同志學習〉。在社論裏，周恩來的題詞

「向雷鋒同志學習憎愛分明的階級立場，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產主義風格，奮不顧身的無產階級鬥志」，成為對雷鋒精神最新的權威概括。這個概括依然突出政黨意識形態的內容。同時，社論還講到了學習雷鋒和「四個現代化建設」的關係，並開始把學習雷鋒和發展經濟聯繫起來<sup>⑫</sup>。一年後，《人民日報》又發表了新華社記者撰寫的文章〈雷鋒精神又發揚了！〉，把教育界的學習雷鋒和趕走張鐵生、學習科學文化知識、尊師重教等聯繫起來<sup>⑬</sup>。

儘管粉碎「四人幫」後《人民日報》對雷鋒精神的闡釋發生了引人注目的變化，總體傾向是淡化「階級鬥爭」，轉而突出「四個現代化建設」、「做新長征突擊手」和「為人民服務」，但雷鋒精神依然兼顧「無產階級戰士」和「好人」兩個方面<sup>⑭</sup>，通過強調雷鋒精神的階級屬性來表明堅持學習雷鋒運動的政治正確性。可見，階級鬥爭這根弦還繃得很緊。富戲劇性的是，當時的文章還認為，「四人幫」「代表地、富、反、壞和新老資產階級的利益」破壞學雷鋒運動<sup>⑮</sup>。

## 二 後革命語境中雷鋒形象的建構

1970年代末，中國進入「後革命」時期。「後革命」的「後」不僅意味着斷裂，同時也表示延續。中國仍然延續了革命時期建立的黨—國體制，也沒有徹底告別革命意識形態以及革命時期確立的道德倫理，而民眾關於「革命」的集體記憶、集體情感在特定時刻也仍然可能被重新喚起。在這樣的語境中，後革命時期的雷鋒形象建構出現了以下值得注意的變化。

首先，革命時期的中國文化是官方文化的一統天下，獨立的知識份子文化和大眾文化均不存在，相應地，也不存在不同於官方的其他版本的雷鋒形象建構。後革命時代則不同，出現了官方文化、精英文化、大眾文化三分天下的格局，也出現了非官方版本的、更富有民間色彩的雷鋒形象。

其次，市場化改革不可避免地包含着對公—私關係、集體—個人關係、生產—消費關係等的重新闡釋。這樣，無論是官方還是知識界，都面對一個重新闡釋雷鋒精神的問題，一個關於如何通過這種重新闡釋來緩解雷鋒精神和市場化時代的矛盾的問題：雷鋒精神過時了沒？它適合今天這個市場化時代嗎？

### (一) 後革命時代雷鋒精神遭遇的尷尬

雷鋒精神在後革命時代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尷尬。由於革命時代政治體制與意識形態的延續性，官方在建構與市場社會、公民社會相適應的新道德、新價值方面顯得捉襟見肘。一方面是機械重複早已過時的「大公無私」的雷鋒精神，另一方面需面對貧富差距過大的嚴酷現實和日益惡化的消費主義生活環境；一方面是容許私欲的無限度惡性膨脹，新資產階級紛紛成為「勞動模範」和「政協委員」，另一方面又時不時祭起雷鋒這面大旗，試圖挽救日益衰頹的世風。

於是，一方面是人們感嘆「雷鋒死了」、「雷鋒叔叔沒戶口，三月裏來四月走」；另一方面則是在「加強精神文明建設」、「建立和諧社會」的官方訴求下，學雷鋒、樹新風的活動在各級黨委和政府的組織下在各行各業一

直轟轟烈烈地操練着，甚至也被利潤掛帥的公司和腰纏萬貫的企業家表演着<sup>②</sup>。

後革命時代雷鋒精神遭遇尷尬的實質在於：在我們今天這個社會，雷鋒似乎根本無法生存。大概由於壞人壞事太多，以及打着好人好事旗號的壞人壞事太多，今天中國的實情是誰做好人誰倒霉，誰做好事誰被嘲笑和懷疑。

1996年上演的主旋律電影《離開雷鋒的日子》，戲劇性地表現了雷鋒精神遭遇的尷尬。沒有任何人懷疑這個看似荒誕的作品的真實性——更加準確地說，雷鋒生前戰友喬安山學雷鋒救老人反被誣告的情節很真實，而被救老人最終良心發現的情節卻顯得很不真實。愈是光明的愈不真實，愈是黑暗的愈是真實，觀眾的這種認識定勢是有其現實依據的。

實際上，現實生活中那些「活雷鋒」的遭遇比電影還要荒誕。比如，2006年11月20日，南京一個名叫彭宇的男子因攙扶一位摔倒的老太太反被告上法庭。法院判決彭宇賠償4萬餘元，判決書稱：「彭宇自認其是第一個下車的人，從常理分析，他與老太太相撞的可能性比較大。如果不是彭宇撞的老太太，他完全不用送她去醫院，而選擇自行離去。」在法官的思維中，見到一個老人倒地選擇不管不顧、「自行離去」才是符合「常理」的，助人為樂、救死扶傷反而是不合「常理」的。判決書還說，如果彭宇是「見義勇為做好事」，那麼，「更符合實際的做法是抓住撞倒原告的人，而不是好心相扶」。這等於說你要麼是不怕死的英雄，要麼是撞了人又試圖抵賴的罪犯，兩者之間不存在別的可能性。在庭審期間，彭宇堅持以後碰到

後革命時代雷鋒精神遭遇尷尬的實質在於：在我們今天這個社會，雷鋒似乎根本無法生存。大概由於壞人壞事太多，以及打着好人好事旗號的壞人壞事太多，今天中國的實情是誰做好人誰倒霉，誰做好事誰被嘲笑和懷疑。

這種事情還會出手相助；但宣判之後，他再也沒有了當初的堅決。此案唯一的證人也悲哀地感嘆：以後誰還會做好事㉞？

由這一事件結合社會轉型期出現的一些道德滑坡現實，一些網絡社區裏貼出了〈雷鋒叔叔的現代生活〉這篇著名的網絡惡搞文章，摘要如下㉞：

雷鋒去南京出差，看到一個老太太被人撞倒在地，雷鋒熱心的把她扶起來，還送她去醫院，貼了200塊醫藥費，結果第二天被法院傳喚，說他撞倒老人，審理結果，賠償4萬塊醫藥費……雷鋒路遇歹徒欲Q姦一少女，雷鋒與歹徒搏鬥，身中三刀倒地，歹徒逃跑，次日警察找到該少女作證，該少女閉門不見，說其甚麼都不記得……

這篇惡搞之文，無非是把人們在現實生活中遭遇到的經驗事實用調侃的語氣寫出來，並讓革命時代的道德榜樣「雷鋒」來做主人公，增加了諷刺的效果。

## (二) 後革命時代官方媒體中的雷鋒

後革命時代雷鋒遭遇尷尬的原因很多，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是官方意識形態沒有能力重新建構一個有生命力的、和新時代相協調的、被大眾認可的雷鋒，使得學習雷鋒活動要麼流於形式，要麼遭遇後現代式的戲仿。

後革命時期的官方意識形態首先面臨的一個難題是如何解釋雷鋒精神和市場化改革的關係。縱觀整個新時期，官方始終沒有完全放棄對雷鋒精神的堅持，但對其內涵的闡釋的確有了不同於革命時代的新內容。首先是

努力把雷鋒形象從一個政治符號（「毛主席的好戰士」）向道德符號（「好人」）轉化，從特定時期出於政治需要建構的政治符號向具有普泛意義的道德符號轉化。儘管如此，雷鋒形象中的政黨意識形態色彩只是被淡化，而沒有徹底消除。

這一時期的官方文章一般都要花很大篇幅論證雷鋒精神為甚麼沒有「過時」，這恰好反映出雷鋒精神即使不是已經過時，也面臨過時的危險。像無私奉獻與按勞取酬的關係、「螺絲釘精神」是否還適合時代要求、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的關係等，都是1980年代關於雷鋒精神討論的熱點問題。

1981年3月5日，《人民日報》以〈八十年代更需要雷鋒精神的大發揚〉為題轉載了《中國青年報》發表的社論〈再論雷鋒〉，這篇文章可以說是新時期官方批駁「雷鋒精神過時」的代表性文獻，但文章同時也透露出對雷鋒精神的修正。文章全面批駁了雷鋒只講政治不懂科學，雷鋒有點「左」，雷鋒沒有自己的主體意識等當時學術界、思想界或社會上流行的觀點，但同時也承認，雷鋒不是「完美無缺」，「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他也可能受到某些錯誤的東西的影響」。這些話在以前的官方媒體是絕不可能出現的。文章在論述個體利益與集體主義的關係問題上採取了和稀泥的辦法：既肯定按勞分配，同時又強調「貫徹社會主義的原則，決不是要提倡獎金掛帥」㉞。

大致而言，後革命時期官方的雷鋒形象建構的觀點可以概括為：雷鋒精神不能丟，但要與時俱進；既否定貧窮社會主義論，又反對個人利益至上㉞。總之，對雷鋒精神採取了既堅持又修復的原則。至於是堅持多一些

後革命時代雷鋒遭遇尷尬的一個原因，是官方意識形態沒有能力重新建構一個有生命力的、和新時代相協調的、被大眾認可的雷鋒，使得學習雷鋒活動要麼流於形式，要麼遭遇後現代式的戲仿。

還是修復多一些，這就要看當時的形勢需要：政策路線「左」一點，紀念雷鋒活動就隆重一點，對雷鋒精神的堅持就多一點；政策路線「右」一點，紀念雷鋒活動就淡化一點，對雷鋒精神的修復乃至反思也就多一點。

最明顯的例子發生在1987年，這是後革命時期官方學雷鋒調門唱得很高的一年。原因是在1986年下半年到1987年初發生了所謂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而學雷鋒則被視為對「自由化思潮」的一種「療救」。是年1月6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社論〈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sup>③</sup>，而在此前的1986年12月30日，鄧小平召集中央領導談話，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在這樣的語境下，1987年3月6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國務院常務副總理余秋里在「學習雷鋒精神座談會」上的講話，其突出特點，就是把學雷鋒與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聯繫起來<sup>④</sup>。

在後革命時代官方的雷鋒形象再建構中，發生了一件頗有意思的戲劇性事件。2003年2月底、3月初，在紀念毛澤東為雷鋒題詞四十周年前夕，瀋陽軍區雷鋒紀念館裏展出了幾張「珍貴」照片，其中包括雷鋒生前戴過的一塊手錶。人們在展出中還發現，雷鋒不僅僅有補了好幾層還在穿的襪子，還有皮夾克、料子褲這些在革命時代顯然不怎麼「革命」的奢侈品。

這種新宣傳方式的主觀意圖無疑在於把雷鋒形象「人性化」，似乎這樣一來，雷鋒就不僅僅只停留在老一輩人的記憶裏，更與新時代接上了軌。但令主辦者意想不到的，這次展出無意中洩露了1960至70年代人們心目中的那個雷鋒的建構、塑造性質，以及它所內含的排除—包含過程，從而

使得革命時期的雷鋒被極大地祛魅，其可信性大降。人們不禁心裏嘀咕：雷鋒到底是真人，還是虛構的？

依據專門拍攝雷鋒的攝影記者張峻介紹，革命年代流傳的很多雷鋒照片，都是經過藝術加工和「合理」修飾的，也有是張峻從《雷鋒日記》裏得到創作靈感，構思出草圖然後在「不違背真實性」的原則下「補照的」（甚麼叫「不違背真實性」？），或者是「經過攝影記者的導演後拍出來的」<sup>⑤</sup>。補拍和擺拍的方式基本上是依據雷鋒報告中介紹的或《雷鋒日記》中記載的好人好事導演的。僅1961年2月間瀋陽軍區準備雷鋒事迹巡迴展時，就補拍擺拍了二十多張照片<sup>⑥</sup>，而對於雷鋒形象中被遮蔽的與「毛主席的好戰士」、「革命英雄」的形象不符而不見於革命時代的小細節，有人這樣解釋：「因為在那個物質匱乏的年代，我們需要一個放棄個人主義、無私奉獻的精神偶像」<sup>⑦</sup>。

對於雷鋒形象的建構過程的揭秘，實際上也是對意識形態權力運作秘密的揭秘，這不僅對消解雷鋒形象的神聖性，而且對於消解意識形態權力話語都是至關重要的。

### (三) 大眾文化中雷鋒形象的疑似「復興」

後革命時期中國文化的一個奇特景觀，就是對革命文化和紅色經典的惡搞。雷鋒作為革命文化的經典符號，也難逃這個命運。如果說後革命時期精英知識份子從新啟蒙的立場認真嚴肅地反思和質疑了革命文化；那麼，在大眾文化領域，雷鋒形象和其他革命文化出現了疑似「復興」的浪潮，即通過一種戲說、惡搞、無厘頭

後革命時期對於雷鋒形象的建構過程的揭秘，實際上也是對意識形態權力運作秘密的揭秘，這不僅對消解雷鋒形象的神聖性，而且對於消解意識形態權力話語都是至關重要的。

的方式使得雷鋒形象再度流行。這種流行同時也是一種祛魅——它本身已經成為一種新的文化時尚。

2001年，雪村的歌曲《東北人都是活雷鋒》，憑藉後期製作的Flash動畫從網絡傳媒迅速傳播到現實社會。歌中唱到：

老張開車去東北，撞了／肇事司機耍流氓，跑了／多虧了一個東北人，送到醫院縫五針，好了／老張請他吃頓飯，喝得少了他不幹，他說：／俺們這旮都是東北人，俺們這旮盛產高麗參／俺們這旮豬肉燉粉條，俺們這旮都是活雷鋒／俺們這旮沒有這種人，撞了車了哪能不救人／俺們這旮山上有針磨，那個人他不是東北人／翠花，上酸菜！

如果說後革命時期精英知識份子從新啟蒙的立場認真嚴肅地反思和質疑了革命文化；那麼在大眾文化領域，雷鋒形象和其他革命文化出現了疑似「復興」的浪潮，即通過一種戲說、惡搞、無厘頭的方式使雷鋒形象再度流行。

很顯然，歌曲把「雷鋒」這個政治—道德符號和「高麗參」、「酸菜」、「豬肉燉粉條」等日常生活中的俗語並置，與吃、喝等俗事混同在一起，在彷彿「肯定」雷鋒的同時解構了「雷鋒」這個術語原先包含的神聖政治意義。

2002年，署名「肖伊緋」的網絡文章〈1962：雷鋒VS瑪麗蓮·夢露——螺絲釘的花樣年華〉風靡一時。該文將兩個同為1962年去世的人——革命政治符號雷鋒與好萊塢明星夢露(Marilyn Monroe)——拼貼在一起，原文的副標題是「茲以此文紀念『螺絲釘』論誕生四十周年」<sup>⑧</sup>。

2003年，瀋陽吉尼斯工作室向英國吉尼斯總部遞交了雷鋒的兩項「士兵之最」，即被創作譜寫成詩歌、曲藝、歌曲最多的戰士和被冠名最多的士兵<sup>⑨</sup>。

2004年5月，在納斯達克(NASDAQ)上市的盛大網絡遊戲公司推出了歷時

半年自主研發的教育遊戲《學雷鋒》，並宣稱這款遊戲的目的是讓青少年以娛樂的方式來學習雷鋒所代表的傳統美德。

此外，還有網絡上流行的關於雷鋒死因的二十條無厘頭解釋，如雷鋒是「幫助人累死的」、「是看樓主的帖子被氣死的」、「是由於駕駛技術不好死的」等<sup>⑩</sup>。寧波一家保健品生產廠家生產的安全套外包裝盒上，也印上了雷鋒手持鋼槍的圖像。

對雷鋒的惡搞，爭議最大的要數2006年「炒作大王」鄧建國要拍網絡電影《雷鋒的初戀女友》之事。聽聞這一消息後，雷鋒生前的戰友致信導演鄧建國，表示強烈抗議。最終，國家廣電總局下文封殺。電影雖然沒有拍成，但網民仍然沒有放過雷鋒，人們從《雷鋒日記》裏尋找蛛絲馬迹並進行加工，把雷鋒和大他三歲的黃麗(王佩玲)之間的關係命名為當下流行的「姐弟戀」<sup>⑪</sup>。

對於網絡上風靡的惡搞雷鋒，人們的意見分歧很大，眾說紛紜。在大部分雷鋒的後流行現象中，無論是作者的政治意圖，還是文本的客觀效果，其實都是晦澀不明的。對這些現象，最正確的形容詞或許就是「疑似」：疑似復興，疑似消解，疑似冒犯，疑似弘揚，疑似……

2009年3月，為了紀念毛澤東「向雷鋒同志學習」的題詞發表四十六周年，由中國傳記文學學會、中共遼寧省委宣傳部、中共瀋陽市委宣傳部和浙江永樂影視製作有限公司聯合製作的大型電視連續劇《雷鋒》即將開拍，並由退役的體育明星田亮飾演雷鋒。對此，很多人心裏就嘀咕：讓一個紀律性差、住豪宅、開名車、緋聞多多的男生飾演雷鋒，到底是對雷鋒精神

的弘揚還是褻瀆還是與時俱進？這就是後革命時期革命形象的曖昧之處。

通過惡搞，參與者或許會產生一種獵奇的快感，或因觸犯革命時代政治禁忌而來的莫名興奮，因為它和精英知識界對雷鋒精神的嚴肅認真的理性反思完全不同。但它似乎更加可怕地透露出一種無可無不可、何必認真的虛無主義和犬儒主義態度：既然在那些表演化、裝飾化、儀式化的場合不能公開反對、批判、對抗雷鋒精神，那我就在網絡世界用不正經的方式和那位過於正經的雷鋒叔叔玩一玩。

這種犬儒式態度的流行，不僅有現實的原因，而且有歷史的根源。王蒙的〈躲避崇高〉一文在分析「痞子文學」——其實也是惡搞——的時候說道：「首先是生活褻瀆了神聖，比如江青和林彪擺出了多麼神聖的樣子演出了多麼拙劣和倒胃口的鬧劇。我們的政治活動一次又一次地與多麼神聖的東西——主義、忠誠、黨籍、稱號直到生命——開了玩笑……是他們先殘酷地『玩』了起來的！」<sup>⑩</sup>也就是說，革命時代國家意識形態所建構的價值、理想、信念、原則——它們的話語特徵就是「崇高」——之所以在後革命時代遭遇惡搞，人們之所以採用大話的方式來「躲避」而不是直接對抗宏大的革命敘事、崇高理想，不僅僅是因為後革命時期依然存在的意識形態控制，也因為這套宏大的英雄敘事曾經殘酷地耍弄和欺騙了大眾。

總結大眾文化中被惡搞的雷鋒形象，我們發現，在後革命時代，國家意識形態一方面希望通過新的方式來繼續發揚革命傳統以維護和延續其權威，另一方面又對革命文化的消費進行制約；而從革命時代成長起來的廣大受眾，一方面在市場化時代對逐漸

消失的理想主義與道德主義懷有曖昧的懷舊，另一方面，又在享受觸犯禁忌的快感的同時，秉持思想慣性對惡搞革命文化表示不滿。這就使革命文化在後革命時代始終處於一種矛盾、曖昧、尷尬、撕裂的境地。

### 三 結語：告別意識形態化道德，走向公民道德

雷鋒形象的建構、重構、解構，是一個具有濃厚意味的政治文化現象。革命時代的雷鋒形象，是黨—國意識形態通過自上而下的方式建構的，它是一個兼政黨意識形態與國家倫理標竿於一身的超級巨型能指。這個能指的示範—規訓力量，深刻地依賴於革命時代的一系列政治、經濟和文化制度，因此從革命到後革命的轉型中其遭遇的困境，都不是偶然的。

首先，在官方文化領域，革命時期行之有效的學雷鋒活動已經形式化和表演化，通常只是作為一種既丟棄不得又不能認真看待的慣例繼續存在，而無法獲得大眾發自內心的認同，也無法發揮雷鋒精神原有的那種道德示範力量和政治規訓效應。問題在於，革命時期的政治體制在後革命時期的延續性，必然導致革命意識形態在後革命時代的慣性運行，從而注定了官方媒體無法徹底拋棄革命時期的英雄譜系，建構一套全新的政治—道德話語，也不可能維持雷鋒精神的原初意義的同時，使之成功地適應後革命時代的新語境。

其次，在啟蒙知識界，對雷鋒的反思也無法深入，原因是這種反思的深入必將觸及黨—國意識形態和黨—國政權合法性的一些深層次問題，從而遭遇後革命時代新聞檢查的瓶頸，

革命時代國家意識形態所建構的價值、理想、信念、原則之所以在後革命時代遭遇惡搞，不僅僅是因為後革命時期依然存在的意識形態控制，也因為這套宏大的英雄敘事曾經殘酷地耍弄和欺騙了大眾。

無論是弘揚雷鋒精神還是解構雷鋒精神，都正在遭遇並將繼續遭遇重重困境。根本的困境還在於雷鋒精神本身，在於其所體現的道德價值本身及其所依託的制度缺陷，這是它無法在市場化時代繼續發揮政治—道德的雙重規範作用的根本原因。

也就是說，對雷鋒的反思必然因中國特色的制度性原因而無法繼續下去。

第三，大眾消費文化雖然可以借助網絡媒體通過惡搞方式消解革命時代的雷鋒形象，但是這種惡搞又因其內在的犬儒主義傾向而缺乏建設性的向度，骨子裏是道德虛無主義和政治虛無主義的。何況惡搞也有邊界，一旦逾越邊界，號稱「玩的就是心跳」的頑主們體驗到的就不再是快樂的「心跳」，而是心驚了。

這樣，無論是弘揚雷鋒精神還是解構雷鋒精神，都正在遭遇並將繼續遭遇重重困境。當然，根本的困境還在於雷鋒精神本身，在於其所體現的道德價值本身及其所依託的制度缺陷，這是它無法在市場化時代繼續發揮政治—道德的雙重規範作用的根本原因。

雷鋒是一個意識形態化的政治—道德符號<sup>①</sup>。意識形態化政治是一種通過某種「主義」或教條一攬子全盤解決問題的政治，是二元對立的鬥爭政治，是唯我獨尊、鼓吹「教主」崇拜的瘋狂政治，它通過走火入魔的意識形態教條控制個人的思想和行為。雷鋒精神就是這種瘋狂的意識形態化政治在道德領域中的體現：瘋狂的教主崇拜，虛妄的集體主義，滅絕個體（從個體利益到個體意識），泯滅主體性，甘做「螺絲釘」和「馴服工具」。

正是這種瘋狂的意識形態化政治成就了雷鋒，更重要的是，也正是它在後革命時代的名存實亡、僵而不死導致了今天犬儒主義的盛行：從警惕那個過時的宏大「理想」，走向嘲笑一切理想；從懷疑那個原先不可懷疑的信仰，走向懷疑一切信仰；從厭惡意識形態化政治走向拒絕一切政治（政治犬儒主義）；從反思宏大的「未來」敘事走向放棄對未來的任何責任；

從極端的狂熱走向極端的犬儒。一句話，今日的犬儒主義肇始於昔日的理想主義。

然而，意識形態化政治狂熱的幻滅並不必然意味着犬儒主義的興起，告別意識形態化政治的途徑並不只有徹底放棄政治一條，虛幻集體主義和理想主義道德的幻滅更不見得必然陷入道德犬儒主義。到底是甚麼導致人們從意識形態化政治的毀滅走向了政治犬儒主義？是甚麼使得原先那種盲目的學雷鋒運動一下子轉到今天同樣盲目的「人不為己，天誅地滅」？

從意識形態化政治直接進入犬儒政治和犬儒式生存的根本原因，是缺少公民政治和公民道德，因為公民道德和公民政治既是對意識形態化政治的否定，同時也可以有效預防犬儒政治。公民政治的基礎是公民道德，包括公民的主體意識、參與意識和責任意識。如果說意識形態化政治的基礎是虛假的「理想」、「道德」、「主義」，那麼，公民政治和公民道德就是一種務實的政治和道德，它建立在對人性的切實理解上，對人性的複雜性持有同情的理解和寬容態度，同時也制訂了可行的制約手段。

意識形態化政治常常需要用那種高調的、統括一切的「理想方案」來進行宣傳鼓動，激發人的仇恨和激情，投入非理性的種族滅絕或階級鬥爭，而公民道德則包含了責任意識、團結精神，它不煽動激情，不鼓吹仇恨，不試圖一攬子解決問題，它「不將人推向英雄主義和聖人品質的極端來揭示人的本性」<sup>②</sup>。意識形態化政治搞領袖崇拜，對「元首」權威沒有任何限制，而公民政治則「謹慎地行使權威，力圖預見到行使權威的後果，同時認識到人類能力不可確定的局限性，以及預見的不確定性」<sup>③</sup>。

總之，公民政治既可以防止意識形態的狂熱政治，也不會墮入甚麼都不相信、甚麼都無所謂的犬儒政治，而沒有良好的公民政治和公民道德，是當代中國人從以前的意識形態政治狂熱轉向今天的犬儒主義政治冷漠的根本原因。明乎此，我們就應該知道，今天應該呼喚的不是甚麼高調的雷鋒精神，而是低調的公民精神。

中國的道德復興之路絕不是雷鋒的復活，當然也不是犬儒的猖獗，而是同時告別雷鋒和犬儒，建立健康理性的公民文化和公民政治。

### 註釋

①③⑤ 師永剛、劉瓊雄：《雷鋒：1940-1962》（北京：三聯書店，2006），頁13；133；230。

② 參見陶東風：〈中國已經進入諸神紛爭的時代〉（2003年7月13日），文化研究網，[www.culstudies.com/plus/view.php?aid=1214](http://www.culstudies.com/plus/view.php?aid=1214)。這個想法得到調查數據的證實。2006年，上海市民信箱網上調查平台曾對2,300位市民進行了抽樣調查。結果顯示，雖然95%的市民知道3月5日的含義，92%的人對「雷鋒精神」有認同感，但當被問及「是否會主動幫助一些需要幫助的陌生人」這一問題時，32%的市民給予了肯定答覆，63%的市民選擇「看情況」。這反映出大家在做好事的時候心存顧慮。更有5%的市民明確表示「不會」幫助。參見〈調查顯示：過半市民認為「學雷鋒」不是盲目幫助人〉（2006年3月1日），新民關注，<http://news.eastday.com/eastday/node17/node136/node5901/userobject1ai76199.html>。

③ 吳若增：〈雷鋒的意義〉，《人民日報》，2004年6月19日，第8版。

④⑦⑧⑩⑫⑬ 雷鋒：《雷鋒日記：1959-1962》（北京：解放軍文藝社，1963），頁15；38；35-36；53；12；6。

⑤ 袁為：〈建國以來政治形象人物的塑造與傳播——以雷鋒為例的考察〉，《黑河學刊》，2008年第2期，頁61-64。

⑥ 雷鋒：《雷鋒日記：1959-1962》，頁2。黑體為引者所加。

⑦ 參見師永剛、劉瓊雄：《雷鋒：1940-1962》，頁37、74、84、98；另見陶克、王躍生：《雷鋒現象》（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3），頁206-209。

⑩ 張峻、趙志華、佟希文、李健羽等：〈毛主席的好戰士——雷鋒〉，《前進報》，1960年11月26日。參見師永剛、劉瓊雄：《雷鋒：1940-1962》，頁121。

⑪ 參見陳廣生、崔家駿：《雷鋒的故事》（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63）。

⑬ 雷鋒既把毛澤東比為母親，也比為父親。1959年×月×日日記：「我的感想」：「毛主席啊像父親，毛主席思想像太陽，父親時刻關懷我，太陽培育我成長。」參見雷鋒：《雷鋒日記：1959-1962》，頁1。

⑭⑮ 參見朱大可：〈國家倫理體系中的雷鋒精神〉，引自西祠胡同，[www.xici.net/b15597/d6988860.htm](http://www.xici.net/b15597/d6988860.htm)。

⑯ 參見甄為民、佟希文、雷潤明：〈毛主席的好戰士——雷鋒〉、《人民日報》評論員：〈偉大的普通一兵〉，均見於《人民日報》，1963年2月7日，第2版；遼寧省軍區政治部批判組：〈從「雷鋒叔叔不在了」談起〉，《人民日報》，1977年11月12日，第3版；雷鋒生前所在連黨支部：〈聽毛主席的話 做雷鋒式戰士〉，《人民日報》，1977年9月27日，第2版；〈再論雷鋒〉，《中國青年報》社論，轉載自〈八十年代更需要雷鋒精神的大發揚〉，《人民日報》，1981年3月5日，第4版等。

⑰ 甄為民、佟希文、雷潤明：〈毛主席的好戰士——雷鋒〉、《人民日報》評論員：〈偉大的普通一兵〉、張俊：〈雷鋒的生活片段〉等，均見於《人民日報》，1963年2月7日。這天的《人民日報》以好幾個整版的篇幅介紹雷鋒。

⑱ 羅瑞卿：〈學習雷鋒——寫給《中國青年》〉、新華社：《〈中國青年〉出

公民政治既可以防止意識形態的狂熱政治，也不會墮入甚麼都不相信、甚麼都無所謂的犬儒政治，而沒有良好的公民政治和公民道德，是今天的犬儒主義政治冷漠的根本原因。今天應該呼喚的不是甚麼高調的雷鋒精神，而是低調的公民精神。

版學習雷鋒專輯 毛主席題詞向雷鋒同志學習 周恩來董必武等同志的題詞和詩文同時發表》，參見《人民日報》，1963年3月5日，第2版、第1版。

⑲ 在1963年，除了毛澤東對雷鋒的題詞以外，其他領導人也為雷鋒題詞，但他們的題詞卻很少被提起，只有毛一人被反覆強調。

⑳ 「兩報一刊」即《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雜誌。「兩報一刊社論」當時被視為規格最高的官方文獻，地位不亞於中央文件。〈向雷鋒同志學習〉，《人民日報》，1977年3月5日，第1版。

㉑ 〈雷鋒精神又發揚了！〉，《人民日報》，1978年3月5日，第5版。

㉒ 這兩個方面分別體現在時任黨和國家最高領袖的華國鋒的題詞：「向雷鋒同志學習，把毛主席開創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進行到底」與權重一時的葉劍英的題詞：「向雷鋒同志學習，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中。參見〈向雷鋒同志學習〉，《人民日報》，1977年3月5日，第1版。

㉓ 〈光輝題詞抹不掉雷鋒精神永發光〉，《人民日報》，1977年1月19日，第4版。

㉔ 2010年3月5日《廣州日報》報導：三十餘位企業老闆跪拜雷鋒巨幅畫像，發起者把這當做一種所謂的「心靈培訓課程」，據稱可提高包括EQ(情商)在內的多種素質。

㉕ 詳見〈男子稱扶摔倒老太反被告 被判賠4萬〉，網易新聞，<http://news.163.com/07/0906/05/3NMDN600011229.html>。

㉖ 參見〈雷鋒叔叔的現代生活〉，百度貼吧，<http://tieba.baidu.com/f?kz=265254738>。

㉗ 〈再論雷鋒〉，《中國青年報》社論，轉載自〈八十年代更需要雷鋒精神的大發揚〉，《人民日報》，1981年3月5日，第4版。

㉘ 詳見關新：〈新時期與雷鋒精神——紀念開展學雷鋒活動二十周年〉，《人民日報》，1983年3月4日，第4版。

㉙ 〈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人民日報》社論，1987年1月6日，第1版。

㉚ 新華社：〈發揚雷鋒精神 培養「四有」新人——余秋里同志在學習雷鋒精神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1987年3月6日，第4版。

㉛ 這些照片詳見師永剛、劉瓊雄：《雷鋒：1940-1962》，頁134-38。揭開這個真相當然是後革命時代的事情了，在革命時代，雷鋒照片的管理是非常嚴格的，像軍事機密一樣被保護起來。

㉜ 肖伊緋：〈1962：雷鋒VS瑪麗蓮·夢露——螺絲釘的花樣年華〉，百度空間，<http://hi.baidu.com/zxtlts/blog/item/b7827a4a4474972708f7ef12.html>。

㉝ 《華商晨報》：〈雷鋒兩項「士兵之最」欲挑戰英國吉尼斯記錄〉(2003年2月19日)，千龍網，<http://china.qianlong.com/4453/2003-2-24/177@696328.htm>。

㉞ 參見〈網上流行另類笑話 竟有人把雷鋒死因概括了20條〉，網易新聞，<http://news.163.com/05/0308/11/1EANMP8D0001122B.html>。

㉟ 詳見〈《雷鋒的初戀女友》被叫停〉(2006年4月28日)，新浪網，<http://ent.sina.com.cn/x/2006-04-28/03321070350.html>；〈雷鋒的初戀女友曝光(組圖)〉(2008年1月29日)，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d73593010089b7.html](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d73593010089b7.html)。

㊱ 王蒙：〈躲避崇高〉，《讀書》，1993年第1期，頁14。

㊲ 「意識形態化政治」是美國社會學家希爾斯提出的概念，詳見希爾斯(Edward Shils)著，傅鏗等譯：〈意識形態與公民道德〉，載《知識份子與當權者》(台北：桂冠圖書有限公司，2004)，頁56。

㊳ 希爾斯：〈意識形態與公民道德〉，頁75。

陶東風 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北京師範大學文藝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呂鶴穎 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